

经济实践论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DOI 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713305>

【摘要】 既有的传统与主流经验主义经济学将“经济”窄化为脱离主体的指标操弄,其本质是通过“工厂化”、“数字化”与“算法化”的数理推演对人类活生生具身实践的全面物化。这一去人性化思潮不仅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中演变为数据的喧宾夺主,亦在唯物史观的后世流传中诱发了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拼凑为机械大厦的“空间地形学”误读。

本文基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提出了“经济实践论”的范式构想,将“经济”从根本上重构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在此视域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物理独立或先后相继的实体,而是同一原初实践在共时维度上的一体两面。其中,解决生存底线物质生产的直接性实践,在逻辑和功能上天然地以其“存在性”统摄着间接性实践的“进步性”。进而,在历时性的历史展开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斗争直接推动着历史的演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本质,绝非一种脱离物质根基的、单向的机械决定,其本身即构成了历史的进步。正是这种在人类实践内部展开的不断撞击与辩证运动,成为了拉动历史齿轮运转的内在源泉。本文的重构不仅荡涤了庸俗经济学的数理真空,亦为唯物史观经典命题的深层理解提供了具有生命质感的本体论奠基。

【关键词】 经济实践论；本体论重构；存在性统摄进步性；双重关系斗争；历史的进步

引言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窄化为数据、模型与指标,使之脱离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活动,沦为见物不见人的冰冷工具。理论越精致,离人越远;公式越完美,劳动的血肉感越稀薄。这一去人性化的理论取向,正是本文写作的直接动因。

而我们所要做的,与上述范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不是在同一张图纸上绘制另一条曲线,而是要把图纸本身翻转过来:让劳动者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体,让长久以来被数据与公式所遮蔽的活生生的劳动,重新回到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经济理论不应只服务于资本的增值,它最应该、最本质的服务对象,是劳动者。

为此,我们将“经济”重新界定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重构,力图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为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用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归根结底,本文不是要在旧地图上绘制新路线,而是要追问:地图本身,是否画错了疆域?

第一节 去人性化经济学的历史谱系与主体的实践复归

在既有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谱系中,“经济”这一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概念,往往被窄化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特定层面,或是被硬性划归为社会有机体之中的某一区域性活动。在这样一种部门化与区域化的理解阐释下,“经济”不可避免地被剥离了其生动具身的主体性根基,蜕变成为一种脱离了鲜活人身的、冷冰冰的数据分析与指标操弄。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日的社会科学分析(尤其是主流经验主义经济学)之中,这种见物不见人的错误思潮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披着技术科学的外衣继续蔓延。现代社科学界试图用冷酷的数据流动来替代人类本真的生命活动,用纯粹的数学公式去阐释原本复杂、动态、具身的人性与社会关系。不可否认,这种高度抽象化、模型化的操作,确实为经济学分析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定量明晰性与数理预测力。然而,在为分析的“科学性”举杯庆贺之时,这种范式却在根本上忽视、放逐并扼杀了最重要、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本体论基石——人本。

这种“以数据代替术语”的分析退化,其实质是通过数理逻辑与公式推演,实现了对人类活生生实践活动的全面“物化”以及去人性化。追根溯源,这一抹杀主体的思潮并非现代算法的突变,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谱系:它始于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生产要素的“工厂化”视角,固化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字化”表征与机械的“理性人”假设,并在今日的新自由主义与算法资本主义中,演化为一切生命维度皆可度量、皆可定价的全面“资本化”。

为了厘清这一去人性化过程的动力机制,我们必须对三大历史阶段进行具体的谱系学讨论。

首先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工厂化”视角与功利主义转向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在确立劳动价值论雏形的同时,也开启了将人类肉身视为纯粹经济要素的“工厂化”视角。这种视角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将人类历史中波澜壮阔的创造性宏大事件,转化并还原为了流水线上追求极致分工效率的机械运动。

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表述所昭示的那样:“我们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1]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社会交往被彻底置换为理性的功利交换。斯密虽然在理论体系中承认了劳动的决定性重要地位,甚至将活劳动置于财富分析的核心聚焦点上,但由于其资产阶级地平线的限制,最终仍滑入了见物不见人的功利主义与还原主义倾向。在《国富论》的分工理论中,人类整体性、创造性的感性实践活动被粗暴地肢解,退化为流水线上进行机械重复动作的“劳动力要素”[2]。主体的创造性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被计算、可任意替换的、无机的劳动力单位。

到了以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阶段,这一去人性化的逻辑在数理工具的加持下达到了巅峰。新古典学者们近乎偏执地追求数字与公式在形式逻辑上的“完美对称”。在追求一般均衡模型的数学推演中,他们粗暴地剔除了历史的维度、时间的流变以及人类在生动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试错”过程。[3]

瓦尔拉斯等人坚信,纯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物理—数学性质的科学,应当遵循类似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定律[4]。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幻觉中,原本具有生机、具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人类实践活动,被硬生生地塞入了毫无阻力的“数学真空”之中。至此,活生生的社会关系被还原为效用函数的求解,具有

历史温度的阶级博弈被异化为供需曲线的无机交点。

这一去人性化脉络在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演化出了更为精致且严酷的控制形态。当下的数字平台与算法逻辑，直接用数据替代了具体的、具身的劳动过程，用无孔不入的算法衡量着整个社会生活。在这里，数据不再仅仅是人类劳动产物的附属表征，反而喧宾夺主，成为了比活劳动更加重要、更加核心、更加本位的本体。

鲜活的、旨在改造世界的具身实践，被彻底囚禁在了算法设计与 KPI（关键绩效指标）的数据牢笼之中。在这样一种由新自由主义和算法逻辑共谋的经济学中，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不再是理论关注的核心，不再是需要被深刻剖析的能动对象，反而成为了阻碍经济学家进行纯粹逻辑分析与本质追寻的“干扰干扰因素”。数据无情地取代了劳动者每一份劳动力的实际具身运用，公式与代码冷酷地取代了在实践中形成的、复杂的、联动的、极具主体互动性的鲜活关系。无论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那些无法被标准化编码的情感、默会知识与主体博弈，皆在算法的量化风暴中被系统性地蒸发了。

而第一位向这种物化与去人性化思潮发起总体性批判进攻的，正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他并非进行单一维度的抗议，而是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两个高度相关的角度，实现着一场对资产阶级旧经济范式的战略性围剿。

这一战略合围，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维度互为依托，构成了坚不可摧的批判共同体：

（一）哲学领域的实践唯物主义合围

在哲学领域，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死结。这一攻击的纲领性表达，集中呈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去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5]。马克思指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类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6]

向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彻底回归，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终极武器。经济学不能从抽象的物质客体或抽象的数据出发，而必须从人改造世界的、活生生的能动实践出发。

（二）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双重解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了对旧范式的去魅与解构：

商品拜物教的全面批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幻化并掩盖为了“物与物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劳动的社会性质被物的外壳所扭曲，使得人们误以为商品的价值是其天然具有的物理属性，从而在根本上遗忘了价值背后所凝结的活生生的人类生命支出。 [7]

强调劳动力的具身性：马克思通过将古典经济学中混为一谈的“劳动”与“劳动力”进行严格的科学区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根本变革。通过对劳动力具身性的强调，马克思揭示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已经展开的“劳动”，而是潜藏于劳动者肉体之中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劳动力”。 [8]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混淆了这一概念，将其分析的焦点——被混为一谈的、抽象化的劳动——变成了数理模型中一个又一个无机的数字、一个又一个脱离了人身体系的要素化商品。

从已有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切的本质，正如我们在《要素的枷锁》一书中

所系统讨论的那样——劳动力的要素化 [9]。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将活生生的、不可分割的具身主体，强制性地拆解并禁锢于要素的牢笼之中。

但是，历史的唯物辩证法同样要求我们正视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局限性。受制于 19 世纪中叶工业时代的历史发展条件，马克思在具体阐释经济范畴时，也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定义为了“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无可否认，这一定义在本质上已经极大地强调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核心本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这里，“经济”在客观上仍然带有着一定程度的部门化与区域化色彩，容易被后人误读为特指“物质生产大后方”的局部领域。

正是因为“生产”与“物质资料”等范畴在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被共同使用，导致后世的许多阐释者与批判者未能深刻识别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们前文所批判的那类庸俗经济学，在本体论上的根本性区别究竟在哪里？

这种范式的模糊性，导致后世产生了严重的误读。许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误认为是一种旧经济学的变体，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经济仍然不过是一种冰冷的、功利性的、脱离了活生生人身实践的结构模型。这是一种极大的历史遮蔽。殊不知，消除这一误读的唯一途径，就是对经济进行本体论式的本真重构：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

第二节 大厦隐喻的空间困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限度

在马克思主义漫长而波澜壮阔的理论史中，最常被提及、却也最容易陷入误区的核心议题，莫过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经典命题。这一关系最初源自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经典比喻 [10]。然而，这一大厦式的隐喻在后世的流传中，极易诱发一种空间化的实体主义误读，仿佛社会结构是由底层的物理地基与上层的坚固建筑拼凑而成的机械拼图。

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深刻指出的那样，这种大厦隐喻固然在直观上形象地强调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它本质上仅属于一种“空间地形学”的隐喻 [11]。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表征工具，它自身并不能提供严密、科学、能够说明社会形态内部复杂动力机制的概括性概念。正是在对这一隐喻的批判与超越中，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艰辛的理论阐释与范式创新，其中最值得我们瞩目和解剖的，便是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作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发起了著名的文化批判。威廉斯敏锐地指出，“基础”绝非一个静止、硬性、预先给定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处在历史洪流中、不断生成的动荡“过程”。与此相应，“决定”这一概念在拉丁语源 *determinare* 的本意中，也绝不意味着如数学函数 $y = f(x)$ 那般的机械派生，而是指历史的前者给后者“设定界限”与“施加压力”。威廉斯倡导将文化重新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坚决捍卫文化生产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与生产性。这一洞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地质学或空间地形学的机械隐喻，试图将理论的视线重新引回活生生的生活总体。然而，当威廉斯试图解决经济基础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协商与张力时，他选择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后来的演进中，不可避免地偏向了温和的经验文化批判或局部的文学文本分析，削弱了其对社会总体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12]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在其《保卫马克思》与《资本论》解读中,则试图通过引入“多元决定”与“结构因果性”的分析工具,来彻底瓦解那种机械的、一元论的经济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的视野里,社会被描述为一个由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实践共同构成的异质、不平衡的复杂整体 [13]。及至晚年,阿尔都塞更加强调从“再生产”的视角去考察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存在。他清醒地认识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绝非附庸于经济地基之上的缥缈幻影,它们在仪式、规章与国家机器的实践中具有真真切切的“物质性”。但在寻找超越机械论的路径时,他的解决方案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过分抬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再生产过程的独特性时,客观上放逐并抛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同时,由于其理论深烙着结构主义的印记,阿尔都塞倾向于强调结构对主体的共时性支配,从而在理论构图中消解了人的能动性 with 革命主体 [14]。

第三节 存在性统摄进步性:生产性与观念性关系的共时同源

在将“经济”重新打回其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这一本体论原形之后,我们便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界,得以重新破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被长期窄化、机械化的经典命题。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一旦摆脱了空间地形学中那种“物理地基加坚固大厦”的实体主义幻象,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非物理空间上相互独立、边界分明的两个客体,亦非历史时间上先后相继、强行拼凑的两个阶段。相反,它们本质上是人类在同一改造世界的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所生成的两重关系,是一体两面、同源共生的辩证统一体。具体而言,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结成的、旨在解决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生产性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旨在确立自我认知与社会秩序的“观念性关系”。上层建筑绝非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神秘、缥缈之物,它本身就是人类为了维持、调节和组织自身改造世界活动而展开的经济实践。在这种视域下,整个社会形态便彻底告别了僵硬死板的、由外部撞击维持的机械模型,而是转变为一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不断进行自我生产、自我调节与自我超越的活的有机整体。

既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本质上均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经济实践活动,那么,为何是经济基础的“生产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观念性关系”,而不是相反?这种“决定”的动力机制究竟是如何在实践内部发生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在本体论上彻底澄清“决定”一词的本真意蕴。我们在这里所诉诸的“决定”,绝非是在重申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奴附庸关系,亦非在确立一种线性时间轴上的“先因后果”或“此先彼后”。作为同一实践过程在不同维度上的展现,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是同时发生、并存不悖的。这一决定关系的实质,在于揭示实践活动内部“直接性”与“间接性”的本质区别,以及由这种区别所衍生出的深层统摄机制。

人类直接性的实践活动,表现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变换,它直接推动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并构成了人类开展一切间接性实践活动的前提和硬性约束。这种影响并非如雷蒙·威廉斯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温和的“划定界限”或外部的“施加压力”。实际上,这一影响的实现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改造世界这一宏大历史循环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人类在通过直接性实践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在重塑着自身的主观世界,从而在实践的底层逻辑上,为间接性实践(即观念、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感性材料与结构性模板。因此,这种决定的本质,既非某种超验的神秘力量,亦非可

以用复杂的数学函数 $y = f(x)$ 予以精确求解的机械因果，而是极具返璞归真色彩的、人类改造世界的原初实践本身。

为了更透彻地把握这两种实践维度的共生与统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直接性实践与间接性实践的内涵进行精确的边界界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探讨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绝非是在讨论活动主体与实践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媒介物——那属于认识论中“直接实践与间接实践”的传统命题——我们所聚焦的，是这两种实践活动与“人类社会存在”这一宏大命题之间的本质关联。

直接性实践的本体论路径是从物质到观念，其核心在于人类肉身直接面对物质世界，在能动的物质生产中产生最初的经验与意识；而间接性实践的路径则是从观念到物质，它试图将已经形成的观念、制度与意识形态重新对象化、物质化为社会运行的规章与秩序。在人类社会绵延不绝的发展进程中，直接性实践直接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即人类如何活下去、如何进行肉身与族群的再生产），而间接性实践则主要是通过实践活动中反作用于直接性实践，来实现对人类社会存在问题的间接性影响。

这就意味着，前者的根本使命在于直接、即时地解决人类社会“何以存在”的肉身门槛与物质基石，而后者则是通过调节、优化和组织前者，来间接地回应并解决社会存在的维系与演进。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极力强调直接性实践决定着间接性实践，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有机体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根基性的决定地位。这一决定关系的本质，是用人类社会的“存在性”统摄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性”。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存在性统摄进步性”这一核心逻辑展开更为深细的讨论。

所谓“存在性”，指的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在物质上维系自身、避免消亡的底线生存状态，它是直接性实践在社会本体层面的表现形式。而所谓的“进步性”，则是人类在生存底线之上，通过制度创新、文化繁荣、政治博弈以及精神升华所展现出的社会向上发展的趋向性，它是间接性实践在观念与社会结构层面的对象化结晶。存在性之所以对进步性具有绝对的统摄作用，是因为任何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与观念建构，都必须以社会“首先存在着”为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前提。

没有直接性实践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持续生产，人类社会就会瞬间面临存在性的崩溃，一切制度设计、法理争鸣与意识形态反思都将成为无源之水。进步性的轨迹、速度与高度，从根本上受到存在性状况的深度规约。人如何生产性地改造世界，以及在其中结成何种利益与力量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该社会中的劳动者与统治者能够“想象”何种进步，能够以何种观念形态参与并组织实践。

正因为社会底线的“存在性”在本体论上天然地统摄着超越性的“进步性”，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旨在解决存在性问题的直接性实践，才必然在逻辑和功能上统摄着旨在解决进步性问题的间接性实践。由此延伸至社会结构层面，作为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生产性关系（经济基础），自然不可避免地统摄着在同一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观念性关系（上层建筑）。

然而，这一论证路径在逻辑上可能会遭遇一个极具诱惑力的理论反诘。有人或许会提出质疑：既然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一再声称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是“同一时间发生、并无先后”的一体两面，那么，人类难道不是在最原初的实践过程中才逐渐结成、并产生意识与观念的吗？人类最初意识的诞生，不正是因为实践在时间上的“在先性”才得以可能的吗？这是否意味着，在时间维度上，生产性的实践依然先于观念性的关系？

为了彻底消解这一逻辑悖论，我们必须严谨地拆解并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概念。

传统庸俗学者口中的实践，往往被窄化为一种独立于观念、意识之外的、纯粹机械性的物质活动。在那种机械论的图景中，人像动物一样进行无意识的物理运动，随后才在脑海中“反射”出观念。然而，我们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类作为能动主体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本身。这一本真意义上的实践，不仅包含着肉身对物质世界的物理改变，同样在一开始就包含着观念性关系的结成。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经典论断：“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5]“生产”这一概念，其本质就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这里的“有目的性”，在本体论上就已经宣告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在诞生之初，就绝对无法脱离观念的参与而独立存在。人类在结成生产关系去改造自然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在共同的社会意图与协作观念中结成了观念性的关系。因此，这两者根本不是谁在物理时间上“先出场”、谁“后出场”的因果递演，而是在同一个原初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共时性维度。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分析中，我们极少会将“同一历史瞬间”内的生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放在静止的无菌室中进行共时性讨论。当我们具体考察社会变迁时，我们往往面对的是历时性的演进过程：要么是“当下的生产性关系与下一阶段观念性关系”之间的张力，要么是“当下的观念性关系对上一阶段生产性关系”的规约与锁定。而我们前文讨论便是如此。

第四节 本能与谋略的历时博弈：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物质闭环

在我们重新讨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向历史的深处迈进，去具体讨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究竟是如何发生、如何传导的。长期以来，这一反作用的具体发生机制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谱系中往往处于被悬置的状态，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式的透彻讨论；而在后续的一系列教条主义、公式化的解读中，这种反作用甚至是在无形中被暗示、被歪曲为了一种脱离了物质根基的、神秘的精神力量在发挥作用，仿佛观念可以直接凭空塑造、扭转客观的经济运行。

在本人早期的理论探索中，虽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机制性缺失的严重性，并尝试对其进行理论攻坚，但这一摸索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与思想的阵痛。在《意识的宣言》一书中，为了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牢牢锚定在物质与劳动的基石上，本人曾尝试将上层建筑定义为一种“劳动力的潜能仓库”。[16]这一尝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已经直觉式地触及到了上层建筑的本质：上层建筑绝非缥缈的幻影，它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经济活动、一种凝结了的经济力量。然而，由于彼时未能清晰地界定“经济”的真实本体论定义，这一模型在试图解释上层建筑如何具有经济力量、如何施加反作用时，却不得不退缩回去，将上层建筑视为一种经济基础的“绝对附庸”，以此来勉强维系整个理论体系的自洽。

这种对“绝对附庸”的妥协，给潜能仓库模型带来了致命性的理论错误。它不仅暴露出由于未能明确经济的真实定义（即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从而导致理论在解释主动性时发生断裂，更使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上层建筑所蕴含的“经济性”，只能在空间地形学的阴影下委曲求全。彼时的思想全然没有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经济内部（即人类实践内部）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上层建筑并不需要通过向经济基础缴械投降、沦为绝对附庸来获得其经济合法性。这种早期的波折，恰恰证明了跳出旧有数理物理模型、重新在实践本体论上重构“经济”定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那么，反作用的具体机制究竟如何在我们重构的“实践”视域中运转呢？为了

揭示这一动态机制，让我们先回到前叙的一部作品《当本能拥有了谋略——人格化的资本》之中。在这部关于资本人格化与政治意志的考察中，我们曾提出过一种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定点论”，其核心命题在于：定点唯一，路径多元。所谓的“定点唯一”，是指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力量自身规律所决定的历史节点；而“路径多元”，则揭示了通往这些定点的历时性过程是充满变数、抉择与摆动的。在剖析路径何以呈现多元态势时，我们论证了一项关键的推动机制：盲目的、以增殖或生存本能为导向的“经济力量”，与自觉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政治实体”之间的斗争与博弈，决定了历史航线的非唯一性。〔17〕

然而，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实践本体论高度重新审视这一博弈模型时，我们必须对上层建筑的内涵进行更为严密和完整的界定。上层建筑绝不仅仅等同于“政治实体”本身，政治实体（如国家、政党、法庭等暴力与组织机构）仅仅是上层建筑在社会政治层面最为凝聚、最具组织化特征的一个显性表现。在政治实体的背后、周围并渗透于其中的，是一个更为庞大、弥散且具有深层塑造力的“意识形态”矩阵，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权秩序、话语体系与文化范式。

意识形态不是虚无缥缈的观念云雾，它是人类主体在具体历史处境中定位自身、理解自身与真实生存条件关系的“认知图式”。如果说经济力量代表着生产性关系中盲目的、非自觉的“本能”，那么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为主体的上层建筑，则代表着人类在实践中试图驾驭、调节这一本能的“谋略”。意识形态在这里扮演着传导和转化的中介角色：它将经济基础中由于生产性关系紧张而产生的盲目阵痛、阶级张力与利益博弈，翻译并重塑为特定的社会共识、法理争鸣、价值准则与审美标准；进而，这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诉求，通过政治实体这一组织化、建制化的工具，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政策、法律条文与社会规制。

因此，反作用的真实传导链条，绝非一个完成了的、僵死的上层建筑以机械因果律（如物理式的力学碰撞）单向地强加于对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是在经济基础（作为生产性关系的承载）与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动态网络）彼此激烈的、活生生的相互博弈中展开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博弈斗争绝对不意味着只有你死我活的简单对立，在具体的历史展开中，它同样包含着双方的合作、吸纳、退让与妥协。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当经济基础中盲目的资本增殖本能或生存本能过度扩张，导致社会面临崩溃的底线危机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便会做出反应，调整其叙事框架与法权评价体系。随后，政治实体通过法律干预、福利国家建设或制度化改良等手段，在维护总体生产性关系的前提下强制性地设定边界。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让步”或“选择性妥协”：上层建筑并非凭空消灭了经济基础的本能规律，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合理化阐释与政治实体的规范约束，为盲目的经济力量修建了宣泄的河道。

在这种博弈、妥协与合作交织的动态过程中，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完成了其物质性的闭环：被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重构的制度边界，反过来逼迫并限定了下一阶段经济基础的运行方式，推动并逼迫着生产性关系（经济基础）进行自身的更新与升维（例如，福利制度与八小时工作制这种上层建筑的建制化妥协，反过来逼迫资本必须减轻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转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与经济基础的全面更新）。

这一宏大过程的本质，就是历史的“自然前进”本身。正是这种政治实体与经济力量、意识形态网络与生产性关系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撞击与辩证妥协，成为了拉动历史齿轮运转的内燃机。因此，反作用绝非一种冰冷、单向且干瘪的

物理力学碰撞，而是一种鲜活的、具身于人类具体实践活动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转化与政治实体的博弈、在无数次斗争与妥协的历时性中不断推动着历史进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不存在上层建筑的单向反作用，存在的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互相博弈斗争的过程中推动历史的发展，而历史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基础的更新，这才是反作用的本质。

引用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4 页。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5—12 页。

[3]〔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97—145 页。

[4]〔法〕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27 页。

[5]〔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9 页。

[6]〔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1 页。

[7]〔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9—102 页。

[8]〔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9—200 页。

[9] 参见 张皓翔《要素的枷锁》，Zenodo 学术平台 2026 年预印本。

访问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10]〔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 页。

[11]〔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5—71 页。

[12]〔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2—116 页。

[13]〔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72—102 页；〔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8—185 页。

[14]〔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43—198 页。

[1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8 页。

[16] 参见 张皓翔《意识的宣言》，Zenodo 学术平台 2026 年预印本，访问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85691>

[17] 参见 张皓翔《当本能拥有了谋略——人格化》，Zenodo 学术平台 2026 年预印本，访问链接：<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941215>